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东 主编



革命与历史

REVOLUTION AND HISTORY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 东 主编



REVOLUTION AND HISTORY

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翁贺凯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品系列/刘东主编,第二辑)

ISBN 978-7-214-22270-1

I. ①革… II. ①阿… ②翁…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1834 号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Copyright © 1978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4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83

书 名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著 者 [美]德里克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卞清波

责任校对 康海源

装帧设计 陈 婕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57.25 插页 50

字 数 3327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270-1

总 定 价 880.00元(精装全十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

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译者的话

阿里夫·德里克先生所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是在其1973年提交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78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初版。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的研究专著。而且，由中国研究起家的德里克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展示出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德里克后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资借，跻身于美国社会科学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其深远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雄心，在三十年前的这部稍显青涩的“处女作”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本书的酝酿、写作和出版是在1960—1970年代，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是如何征服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著名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此提出了一种富有刺激性和启发性的解释，他在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的第三卷《历史意义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是

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解决自 19 世纪西方冲击传统中国以来,令他们困扰不已的“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智”,对于中国历史的情感依恋与对于西方价值的智识向往)之间矛盾的凭借与方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通过表明中国历史自身也发展出了一条并不仅限于其自身的发展道路,通过展示出现代西方的价值(布尔乔亚价值)同样受时间限制这一性质,有效地减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的自卑感,满足了他们想使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平等化的渴望;另一方面,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是社会经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儒家思想并非整个中国历史的属性,而只是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属性,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与现实无关的历史遗迹送进博物馆中陈列和维护,这种对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暨儒家思想的历史化,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在现实中勉强接受抛弃传统价值的要求,达致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妥协。^①

《革命与历史》一书对列文森的上述解释提出了反驳。德里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它舒缓了列文森所谓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思想与价值的压倒一切的关注或许是 20 世纪头 20 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情况,但是将这二十年作为整个现代中国历史的范式却是一种误导;列文森在就思想而论思想上走得太远了,他对于思想价值的过分强调遮蔽了中西冲突的物质的基础与结果——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德里克强调:1925—1927 年的国民革命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的钥匙——1925 年五卅运动之后群众运动在城市和乡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变革的观

^①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念认识,取代此前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整体性的激进的社会革命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中心关注点,中国知识界的这一转向,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通过“社会学”这一媒介得到了广泛传播——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一种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唯物史观“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程度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而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所引发的对于革命前途的思考与探索,进一步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摆脱共产国际教条指令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进行严肃的分析——在随之而来的“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亦可笼统地合称为“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成为论战各派成员所共享的理论前提和知识背景,由此也初步奠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革命与历史》一书的主体部分正是对“社会史论战”中的史学撰著和争论的仔细检视:国民党反对派(“新生命派”)、中共(“新思潮派”)和“托派”(“动力派”)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析,陶希圣、朱佩我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争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所引发的批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各派争论,等等。德里克在行文中非常注意去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前途的关注是如何影响他们历史写作和理论选择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绩和贡献呢?德里克在对于全书具有“点睛”意义的第七章中,做了宏富、精彩但又带有些许暧昧色彩的探讨:一方面,在世纪之交中国史学宏观演进的脉络下,德里克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造了新的研究“范式”——“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论他们的历史分期方法多么机械,亦是为他们寻求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经济分界线的理论预设所驱使。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阐明了那些被早前的史学家所忽视或低估的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的意义”(英文原书,页250),刺激中

国史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系统的和更富批判性的研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德里克却明确宣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有效结合上的失败:“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的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显著的一些细节。而在另一方面,那些以确定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见长的史学家,却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变形走样……”(页230)德里克发现:贯穿整个社会史论战,在革命激进主义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普世法则的捍卫之间,在反对阶级斗争、激进革命与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辩护之间,有着清晰的对应关系。在此,德里克关注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经验,还有这种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启示与涵义。德里克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困境很大部分是源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马克思的关注点摇摆于革命与历史之间,他实际上构造了两种社会模式:一是社会由动态的相互关联的成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structural model);一是阶级斗争决定所有社会构成配置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bipolar model):构造性模式更能说明“正常的”历史状态——此时不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社会的、经济的关系都表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而两极性模式最适于革命的情势之下(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这时复杂的社会在其内在矛盾运动和革命实践的作用下,分解为两大敌对的阶级阵营。德里克认为,正是由于阶级在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特殊作用,在激进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否定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负面意义格外敏感,这使得他们大多倾向接受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断言,以确保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德里克根据战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近成果指出：将社会作为一个各个部分组成的彼此关联的系统进行处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最有效力的；而若将社会作为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刻板结构，辩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特定的生产（阶级）关系并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套普世的社会发展形式，不啻于取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身的有效性、使其简化为一种无用的初级的历史方法——因此，无论从理论和革命的角度而言多么正当，现实的政治考量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是无益的——相当程度上正是这种考量的干扰使得绝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先入为主地将普世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造成了对于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解释的双重简化，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到此为止，德里克的论述逻辑都还是自洽的和富有说服力的。然而，他最后又指出：1920—19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甚至“对于革命事业也鲜有帮助”，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的整套革命策略“并没有从历史中获益多少”（页257）。德里克似乎全然不知1920—19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1930—19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有颇多的助益，他一方面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革命几无助益——最后这一刻，他就史学而论在史学上似乎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开始背离了自己的初衷，这着实令人有些不解。

不管怎样，对于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以及这种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含义的读者而言，《革命与历史》都是值得一读的。中译本出版短短三年来，已经第三次重印并被收入“凤凰文库”，也证明了这本著作的生命力。在此我要向德里克先生表示祝贺！

翁贺凯

2008年6月于北京清华园

中文版序

对于一位作者而言，自己的著作被译为另一种语言，得以与另一群读者谋面，总是一件乐事。而这一次，快乐是双倍的：《革命与历史》一书初版于1978年，近30年后，此书仍有其学术价值，能再次出版，作为作者，我无疑感到非常振奋。

再版本来也提供了一次修订的机会，但这次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中译本做任何修订。在这篇小序中，我想略述其缘由。

过去的20年间，中国史学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我写作《革命与历史》一书时，中国的历史学仍然处于革命史学所提出的问题框架之内；而在美国，尽管不少学者对于革命兴趣盎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政治，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20年的鄙弃之后，也不过刚刚开始复苏。当时，美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的学者，基本上还是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海外的学者们根本无法接触和使用那些藏在中国大陆图书馆中的丰富的史料文献。

今天这一切都改变了——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史学的冷落——特别在后革命的气氛实际上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减弱的时候，这种冷落更甚于前了。不过反过来，这也使得《革命与历史》中

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别有一番意义。

当翁贺凯先生决定翻译此书的时候,我确曾考虑过对它略作调整和修订。我倒并不认为有任何的理由去改变此书所提出的解释,因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课题,在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都没有出现太多新的值得我去修订的东西。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历史学,都经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再解释,但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令保持革命与史学写作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加具有必要性——这种联系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解释性的根基。当然,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的话,我也许不会那么自信地指出“中国农民们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阅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及读物”^①——尽管我现在对此也还不是非常确定,不过无论如何不一定是农民。

关于修订,也确曾有过以下一些考虑。首先,关于本书所讨论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人物,近年来有一些新材料出现,不过并不是很多。中国大陆的读者无疑很容易看出:对于一些(但肯定不是全部)论战的参与者,例如严灵峰,我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此书时所能找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是此书所涵盖的范围。最初写作本书时,我总是遗憾我未能更多涉及战时(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中国史学——它可以将20世纪30年代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连接起来。现在,随着越来越多新材料的出现,有关战时中国史学的研究更具可能性了。不过我同时也意识到,这将是一项独立的研究,它需要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家纳入考量的视野,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问题。

还有一个修订的方案,是将我在《革命与历史》发表之后所写的有关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于封建主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历史解释中的阶级问题的讨论等几篇相关的论文纳入本书。

^① 参阅本书第八章倒数第三段。

不过,缺少了关于战时中国史学的讨论,这几篇文章的加入,很可能会破坏原著叙事(narrative)的连贯性,它们看起来会更像附录,而不是全书整体的一部分。同时,翁贺凯作为译者也认为,这几篇文章的加入,会令全书的篇幅偏长,并影响原著的一致性。最后,我们决定放弃。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完全是 1978 年初版的中译本。诚然,一些细节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作为作者,我觉得本书的基本论点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我当时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拒斥目的论——无论是革命的目的论,还是历史的目的论。历史学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嬗变和发展,已然证实了我在全书最后所作的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1978 年之后中国政治情势的改变,导致了史学的重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写,而且是中国过往历史的重写——随着“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都成为聚讼纷纭的问题,后者更显得越发复杂难解了。尽管今日,革命已成遥远的往事,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趋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发现,已然成为当代史学主流(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在凸显政治和历史之间无可消解(irrevocable)的关系上,仍然保有其批判的力量。

最后,感谢翁贺凯承担了这项艰辛的翻译工作,感谢我的朋友刘东将本书纳入其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阿里夫·德里克

2004 年 2 月于俄勒冈大学

(翁贺凯译)

序 言

在这本书中,我对于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间或显得尖锐了一些。但是应该注意,这些批评纯属思想性的或是关乎史学本身的,是建立在我对他们著作的相对优劣的评估之上的。我尽量不遗漏他们著作中的每一个闪光之处;我寄予了最多个人之“同情的了解”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史学造诣最令我钦佩的学者。在那个仅仅提及马克思主义就会引起反感或敌意的年代,当权者会毫不犹豫地用暴力来镇压思想异端,仅是从事这样的史学活动往往就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马克思主义者们被搜捕、被审查、被监禁,甚至仅仅因为发表了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一些观点而被拷打和折磨。我在书中忽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生命经历的这些方面,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无足轻重,而是因为那将会是另一项完全不同类型的研究。在本研究中,我按照我所认为的评估一切史学著作的一般方法,来评估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的贡献——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作为史学著作而被撰写出来的,这是对其使命给予严肃赞赏的唯一的方式。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迪是这些著作在历史解释上有所贡献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同样无法承受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托辞——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具有超史学的(extrahistoriographical)

意涵,它们可以被免于按照史学批评的标准进行评估。

2 本书之所以能问世,首先要感谢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历史系的师友们。1964年我被录取为那里的研究生,如果不是他们对于课程设置的开放思想,如果不是他们愿意给一个此前在历史学和中国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训练基础的外国学生机会,这本书,无论它可能有多少的优点,都不可能产生。我要特别感谢前历史系的两位老师:哈利·哈鲁图年(Harry Harootunian)和悉尼·莫纳斯(Sidney Monas),是他们引领我进入历史这门学科。当学校的条件满足不了我的学习需求时,历史系总是慷慨地给予我资助,使我得以四出外游、顺利地开展我的研究。对于拉尔夫·克罗兹尼尔(Ralph Croizier)这位后来加入历史系,并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推荐这一论文课题(它最初本是一项关于陶希圣的研究)的老师,我怀有的不仅是一位研究生对于导师的感情,更有一份朋友般的欣赏与感激。

我的朋友拉利·施耐德(Larry Schneider),是本书出版之前唯一通读全稿的人,我非常感谢他毫不吝惜时间,并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从百忙之中抽时间阅读了我的论文,并鼓励我将其出版。我同样要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Ed Friedman)和张灏(Hao Chang),他们通读了本书最初的导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北卡大学的塞缪尔·巴朗(Samuel Baron)慨然向我提供了当代苏联关于亚细亚社会问题讨论的资料。

我要感谢杜克大学历史系的萨普(Dorothy Sapp)和我的研究生汉普希尔(Particia Hampshire)为我打印了本书的文稿。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卡罗尔(Carol)和我的两个孩子内迪姆(Nedim)和穆拉特(Murat)对我个性的包容——这种个性在我写作的时候表露得尤为明显,谢谢你们!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中文版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问 题 1

第二章 背 景 17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9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42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48

1927 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49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53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58

论战及其意义 76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80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87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 109

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117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120

奴隶制问题 125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134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147

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155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163

社会史论战 170

论战的消退 185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 189

第七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 193

第八章 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221

参考书目 229

译后记 246